

# “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sup>\*</sup>

黄萌萌

**内容提要:**近年来,德国全民政党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而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以及建制派小党的选票不断增多,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加剧。本文以分析德国选民群体为出发点,引入德语文献中的“政治环境”概念,描述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基本特征,观察近年来德国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党偏好变化;以2017年德国大选为例,从“政治环境”视角探析德国选择党崛起、全民党式微的原因。一方面,观察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联邦州势力倍增与选民的经济、就业和教育背景的关联;另一方面,分析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分歧对全民政党内部矛盾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 “政治环境” 政党格局 选择党 全民政党

## 一 问题的提出

2017年9月,德国举行大选,全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的选票大量流失,联盟党得票率为33%,为1949年以来最低;社民党仅获得20.5%的支持率,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差的纪录。而成立于2013年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12.6%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紧随其后的自民党、左翼党和绿党都取得了好于上届选举的战绩,选票率分别达到10.7%、9.2%和8.9%。<sup>①</sup>在联邦德国历史上首次有6个政党进入议院。德国政党格局出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碎片化状态。在经历了德国史上最长、最艰难的组阁谈判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在2018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洲选举年后美欧关系及对我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CGJ01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sup>①</sup> „Bundestagswahl 2017 Deutschland“, <https://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index.shtml>, last accessed on 2 February 2018.

年3月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然而组阁之后,执政党的支持率不升反降,半数难保。全民党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而像选择党之类的小党异军突起。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内学界多数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左右翼政党立场趋近、丧失原有的铁杆支持者,同时未及时调整政治纲领以吸引具有新的政治诉求的选民。但对于选民如何发生政治价值取向的变化并改变了政党偏好的系统分析和考察尚显不足。

基于此,首先,本文引入德语文献中的“政治环境”概念,通过梳理其不同的类型及表现,描述与此对应的选民政治价值取向及政党偏好,<sup>①</sup>并概括德国政治生态变化的特点。其次,以2017年德国大选为案例,从“政治环境”的视角探析德国选择党崛起、全民党式微的原因。一方面以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联邦州势力倍增为观察对象,分析全民政党与右翼民粹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与选民的经济、就业和教育背景的关联;另一方面,分析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分歧对于全民政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的影响。

## 二 “政治环境”:一种分析框架

### (一)“政治环境”的概念内涵

传统上,学界一般使用“政治光谱”或者“诺兰曲线”等理论来分析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但上述方法通常以不同政党的政治主张为研究对象,较少分析不同群体选民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偏好。其他如“政治指南针”(political compass)理论也尝试了从社会与经济双轴象限观察个人或政党政治倾向,但也是过于关注政党的政治定位,忽略了不断变化中的选民政治偏好。这些传统分析视角对于2017年德国大选中全民政党式微、选择党崛起的现象解释力不足。笔者认为,“政治环境”概念为观察国内选民的政治意见与诉求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可以更精准地分析不同选民群体的政治诉求和政党偏好与他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

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环境”(politische Milieus)类型是从“社会环境”(soziale Milieus)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在韦斯(Ralph Weiß)和贝克尔(Ulrich Becker)的著作中,“社会环境”概念致力于分析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基本价值倾向、行为方式及观念,它们和选民收入、固定资产、教育程度及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社会环境”是人为划

<sup>①</sup>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Was verbindet, was trennt die deutschen? Werte und Konfliktlinien in der deutschen Wählerschaft im Jahr 2017“, Hans Böckler Stiftung, Düsseldorf 2018, S.6-10.

分的社会结构分组,相同社会结构人群(包括社会阶层)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与生活观。<sup>①</sup>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如增长、缩减、分化、消失或者衍生。赫拉迪尔(Stefan Hradil)对“社会环境”的定义是,具有相似生活状态、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特征的人群,其分类与职业、收入以及教育等级有关,可用于解释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相同的“社会环境”类型人群对于周围环境的阐释与构建方式相近。<sup>②</sup>

“政治环境”的概念将个人的政治价值观与政党偏好类型划分与其职业、社会阶层以及教育程度相关联。具体而言,受自身经济状况与教育程度的影响,选民群体分布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双轴象限内,形成具有不同政治倾向与政党偏好的“政治环境”群体。“政治环境”概念主要关注选民的政治观念,用于区分不同选民群体的政治价值取向、政党偏好、社会结构特征、职业情况以及生活观。简而言之,“政治环境”概念以选民群体的政治立场与政党偏好为研究对象,是将一国选民的社会经济情况、政治认知及其政治行为方式相互关联的分析方法,也是研究德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下政治生态变化的新视角。<sup>③</sup>

## (二)“政治环境”的传统类型

在诺伊格鲍尔(Gero Neugebauer)的研究中,不同的“政治环境”类型是由选民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受经济和社会条件影响而产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冲突划分的。<sup>④</sup>他认为,传统政治“左”“右”光谱之分不足以解释德国民众的选举行为,选民的价值观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公平或自由市场导向型、权威主义或自由主义,以及坚守基督教信仰或奉行文化宽容等不同的认知标准构建了民众的不同价值观,这给德国全民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明确纲领界线并且稳固原有选民基础带来诸多挑战。<sup>⑤</sup>

根据诺伊格鲍尔对德国“政治环境”的研究,2006年德国选民的“政治环境”类型可分为九种:纵轴自下而上为社会文化领域内的权威主义或自由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或宗教宽容,横轴从左向右为经济领域的社会公正或市场自由。其分析数据基于

<sup>①</sup> Rainer Geißler, „Die Sozialstruktur Deutschlands. Zu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it einer Bilanz zur Vereinigung, 4. Auflage“, Wiesbaden 2006, S.116.

<sup>②</sup> Stefan Hradil, „Soziale Milieus- eine praxisorientierte Forschungsperspektiv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44-45/2006,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S.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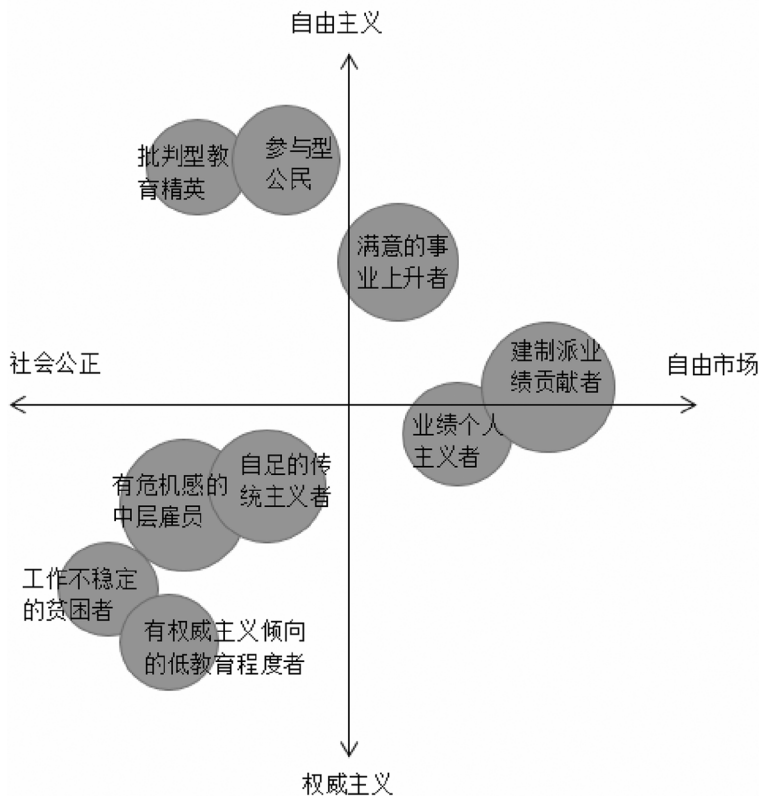
<sup>③</sup> Ralph Weiß, „Politisch-kommunikative Milieus. Notwendigkeit und Nutzen einer milieutheoretischen Analyse politischer Kommunikation“,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2009, 57 (1), S.3-22; Ulrich Becker, Horst Becker, Walter Ruhland, „Zwischen Angst und Aufbruch. Das Lebensgefühl der Deutschen in Ost und West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Düsseldorf 1992, S.80.

<sup>④</sup> Gero Neugebauer, „Politische Milieus in Deutschland“,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2007, S.26-27.

<sup>⑤</sup> Gero Neugebauer, „Politische Milieus im Links-Rechts-Raum“, *Neue Gesellschaft Frankfurter*, Hefte 5. 2008, S.46-48.

2006年“TNS Infratest”针对3021位18岁以上具有选举权的德国公民的民调结果,询问内容包括日常生活观、年龄、职业、经济、对国家与社会认知、宗教观、政党认知以及选举行为等。根据调查结果,诺伊格鲍尔将“政治环境”类型分为九种:“批判型教育精英”“参与型公民”“满意的事业上升者”“建制派业绩贡献者”“业绩个人主义者”“自足的传统主义者”“有危机感的中层雇员”“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和“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低教育程度者”,其社会文化与经济秩序偏好如图1所示。

图1 2006年德国“政治环境”类型定位



资料来源:Gero Neugebauer, „Politische Milieus in Deutschland“, S.68,93. 图由作者自制。

2006年德国九种不同“政治环境”类型下选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政党偏好及所占选民人数比例如表1所示。处于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选民在2006年对全民政党的支持率仍然遥遥领先,“业绩个人主义者”“批判型教育精英”以及“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类型除外。德国小党,如自民党、绿党以及左翼党仍未在各个“政治环境”群体

中获得明显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类型中已出现极右翼政党偏好。

表 1 2006 年德国“政治环境”类型的政党偏好与选民比例

政治环境类型	社会经济状况	政治环境类型 首要政党偏好	所占选民比例
业绩个人主义者	社会上层	自民党 社民党	11%
建制派业绩贡献者		联盟党 社民党 自民党	15%
批判型教育精英		社民党 绿党 左翼党	9%
参与型公民		社民党 联盟党 绿党	10%
满意的事业上升者	社会中层	联盟党 社民党	13%
有危机感的中层雇员		联盟党 社民党	16%
自足的传统主义者	社会底层	联盟党 社民党	11%
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低教育程度者		联盟党 社民党	7%
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		社民党 左翼党 极右翼政党	8%

注:表由作者自制,相关内容参见 Gero Neugebauer, „Politische Milieus in Deutschland“, S.68-84。

### (三) 德国“政治环境”的新类型与特征

2006-2017 年,德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却无法缓解东、西部联邦州之间的贫富

差异与就业率差距、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疑欧情绪以及因难民危机激发的对“多元文化”和“欢迎文化”的质疑。当选民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政治诉求也相应调整时,沿用2006年的“政治环境”类型划分显然已不合时宜。虽然,其“批判型精英”“参与型公民”以及“不稳定的贫困者”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但社会中层选民的政党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政治冷漠程度、不确定性、对于开放型社会的质疑、为社会所忽视感以及对全民政党的不满意度上升。<sup>①</sup>

2017年,希尔默(Rita Müller Hilmer)和加涅(Jérémy Gagné)以当年德国大选为例对选民的政治认知、价值观冲突和选举行为的延续性与发展做了详细研究。在2006年为艾伯特基金会撰写的研究报告《改革进程中的社会》(Gesellschaft im Reformprozess)<sup>②</sup>以及诺伊格鲍尔对“政治环境”类型划分的基础上,2017年,希尔默和加涅对4900名受访者展开问卷调查,在其为伯克勒基金会撰写的研究报告中与2006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衍生出九种新“政治类型”,并将其沿经济视角的横轴(自由市场与社会公正)以及社会文化视角的纵轴(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象限重新定位。<sup>③</sup>诺伊格鲍尔将该九种类型以“政治环境”概念定义,而希尔默将此称为“政治类型”。实际上,从分析方法来看,二者类型划分与内容框架一脉相承,但希尔默未对“政治类型”做出严格定义。因此,本文沿用诺伊格鲍尔的“政治环境”概念对新类型进行描述和概括。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06-2017年间,德国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与价值观分歧,选民类型继续分化,也由此诞生了希尔默和加涅归纳的新“政治环境”类型。他们延续了2006年的研究方法,针对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尽量保持相似特征,但针对新的德国社会矛盾,如难民问题等,加入了新的调查,并针对受访者的职业状况与生活状况做了更为详细的调研。<sup>④</sup>

根据希尔默和加涅的研究,“建制派业绩贡献者”变为“保守的守财者”,“满意的事业上升者”与“自足的传统主义者”归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意的一代”,“业绩个人主义者”变为“不确定的业绩个人主义者”,“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低教育程度者”成为“社会边缘的单独奋斗者”,而“有危机感的中层雇员”衍变为“失望的中产雇员”及“被轻视的业绩贡献者”。德国选民群体构成的新九种“政治环境”类型具体特征描述如下(见表2)。

<sup>①</sup>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y Gagné, „Was verbindet, was trennt die deutschen? Werte und Konfliktlinien in der deutschen Wählerschaft im Jahr 2017“, S.3.

<sup>②</sup> Rita Müller-Hilmer, „Gesellschaft im Reformprozess“, Friedrich-Ebert-Stiftung, 07.2006.

<sup>③</sup> Ibid., S.4-5.

<sup>④</sup> 由于在调查中无法保证选民群体的完全一致性,因此在分析方法上仍有瑕疵。但笔者认为,相对于传统方法,它的分类更为细致,更接近选民群体的实际情况,对我们深入理解德国政党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表 2 2017 年德国新“政治环境”类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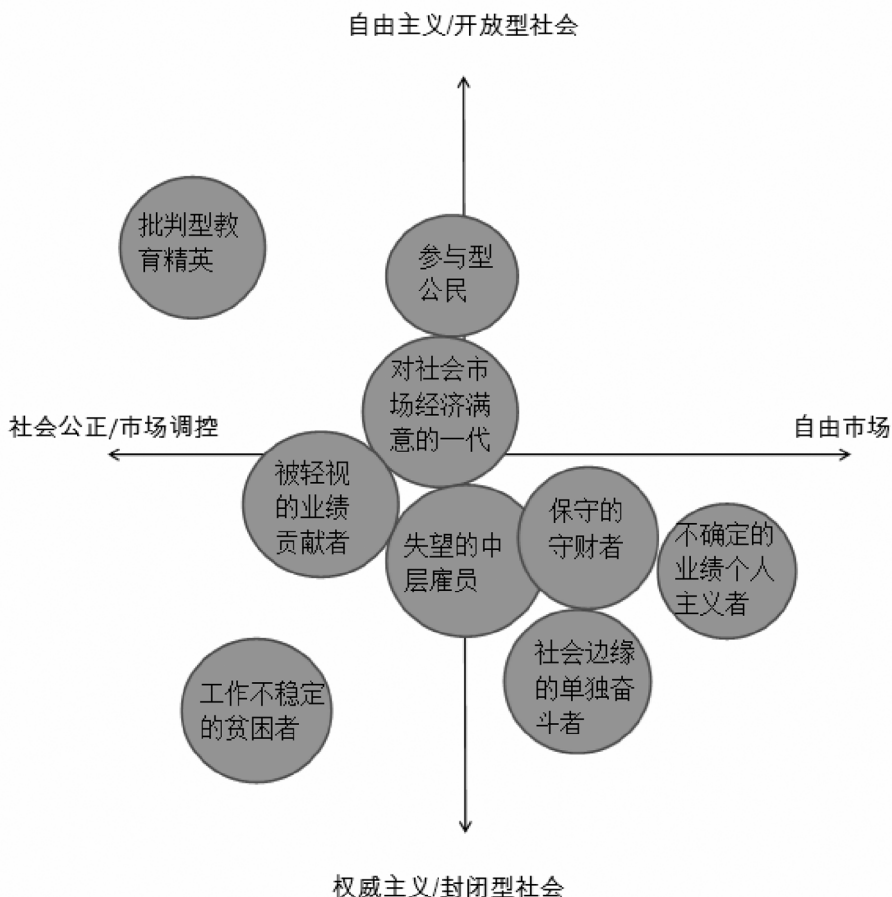
对生活与社会条件的态度与比例	政治环境类型	政治价值取向	对德国民主制度的态度	所占选民比例	政党偏好	社会经济地位
满意者,占 43% 由世界公民和年轻一代组成。 前者从全球化与新技术中受益; 后者享受到社会福利,兑现业绩报酬,经济状况较好	参与型公民	开放和文化宽容型社会;支持欧洲一体化、全球化和国际合作; 社会团结与机会平等	政治参与性高; 对代议制民主制度满意	18%	联盟党 社民党 绿党	社会上层
	批判型精英	开放和宽容型社会; 全球合作; 主张社会公正; 探索其他经济模式	具有自我主张和较强政治兴趣; 赞同代议制民主制度	9%	绿党 左翼党	
	对市场经济满意的新一代	维持市场经济; 对社会成就感到自豪;坚持自由社会法制与秩序; 介于民族国家与全球机制之间	对选举有较大兴趣; 政治上的保护需要满足; 较信任现有的政治体制	16%	联盟党 社民党	社会中层

<p>不确定者,占32% 认为其应得的业绩利益报偿与社会福利因全球化、新技术和大量移民而面临挑战; 但总体上认为社会应更具有竞争力</p>	保守的 守财者	支持市场与业绩导向型社会; 坚持德国“自我主张”与“认同”; 强调法制与秩序; 支持民族国家	政治不积极; 政治机制信任度低; 质疑言论自由; 期待更有效率和经济友好型领导	10%	联盟党 选择党 自民党	社会上层
	不确定的 业绩个人主义者	支持市场与业绩导向型社会; 对外维护德国利益; 介于民族国家与全球机制之间; 主张传统型社会,对移民具有矛盾心理	政治兴趣不高; 不积极参与选举; 感到被忽视; 期待强人领导	9%	联盟党 选择党 社民党	社会中层
	社会边缘的 单奋斗者	支持强者权力,主张竞争而非社会公正; 贯彻德国利益,对移民具有矛盾心理; 支持权威干预; 介于民族国家与全球机制之间	政治冷漠,不积极参与选举; 质疑德国民主体制; 希望强人领导承担责任; 可以放弃法制国家制度	13%	联盟党 选择党 社民党	
	失望的 中产雇员	希望兑现业绩承诺并重建社会福利保护机制;主张民族国家机制,维护德国主流文化; 阻止移民与难民流入	被忽视感,认为是政治精英之过; 疏离代议制民主制; 政治参与度低,不参加投票选举者较多	10%	联盟党 社民党 左翼党 选择党	社会底层
	被轻视的 业绩贡献者	主张社会公正; 视移民和国际人才流动为威胁; 支持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平等与全民福利; 支持有秩序的保守型社会,但不支持权威主义;支持民族国家机制	有政治兴趣,但对于政治提供的保护很失望,认为是政治精英之过; 对于德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信任度低; 倾向直接民主制	10%	选择党 左翼党	
	工作不稳定的 贫困者	国家提供全面担保以及构建养老型的社会福利国家; 严格拒绝移民入境,反对开放型社会; 民族沙文主义者	因无法满足自身保护诉求而远离政治,不参加选举者较多; 完全不信任德国政治机制,并持批评态度; 要求通过强人领导执行民众意愿	5%	选择党	

注:作者根据希尔默和加涅于2017年提出的新九种“政治环境”类型自制。参见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Was verbindet, was trennt die deutschen? Werte und Konfliktlinien in der deutschen Wählerschaft im Jahr 2017“, S.22-39。



图2 2017年不同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价值偏好



注:图由作者自制。相关内容参见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Was verbindet, was trennt die deutschen? Werte und Konfliktlinien in der deutschen Wählerschaft im Jahr 2017“, S.16-17。

基于诺伊格鲍尔在2006年有关不同“政治环境”类型所处的价值观坐标划分,希尔默和加涅得出的结论是: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德国选民对于“社会公正”和“自由市场”的认知并无太多变化,多数“政治环境”类型选民仍然位于“社会公正”象限内,希望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维护社会整体福祉。然而,很多“政治环境”类别群体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这与民众对“开放型”或“封闭型”社会以及“文化宽容”的认知变化密切相关。因此,不同“政治环境”类型针对德国所面临的难民与移民问题、欧洲一体化以及承担国际责任的观点分歧最大。2017年,由于德国选民的“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加剧,如国家自豪感、维护主流文化、质疑

难民与移民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认同上升,德国出现“政治环境”右转的趋势。在新九种“政治环境”类型中,仅有“参与型公民”和“批判型精英”仍处于自由主义与开放型社会认同的象限内,占全部选民比例的27%,而其余选民或是处于保守主义与德国主流文化认同的“权威主义”象限内,或是处于中间地带,对此犹豫不决(见图2)。在德国代议制民主政体中,“不确定性”与“失望型”或者“抗议型”选民开始寻求政界的不同代表。其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其新的政党偏好之一,这不仅加剧了德国政坛的路线冲突,同时也加剧了德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

### 三 “政治环境”变化与德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

与2006年相比,2017年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分别流失9%与11%的选票。2017年初原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从欧盟空降德国政坛,以百分之百的得票率当选社民党主席,其选民支持率在2017年第一季度曾超过默克尔。然而“舒尔茨效应”昙花一现,在9月的联邦大选中,社民党虽然保住第二大党地位,但仅获得20.5%的选票。从历史得票率来看,社民党收获自1953年以来德国历史上的最差战绩;而联盟党的支持率也仅为32.9%。<sup>①</sup>最大的胜利者无疑是右翼民粹势力——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达到12.9%,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成功跻身联邦议会最大反对党,不再是名噪一时的话题性政党。德国全民政党式微、选择党崛起与德国不同的“政治环境”类型密切相关。

#### (一)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以德国东西部“政治环境”差异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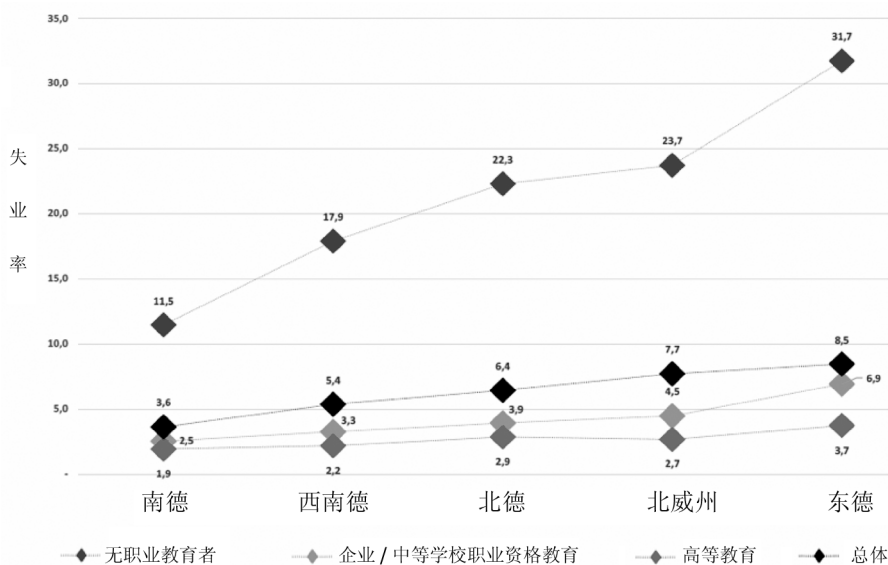
从竞选纲领来看,德国选择党与其他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观点具有相似性,以反欧元、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反对欧洲主流社会文化为穆斯林文化侵蚀、抵制接受难民而著称,并与极右翼势力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在欧洲债务危机以及难民危机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工具极易获得经济弱势选民、基督教保守派以及全球化和一体化失利者的同情与支持,这从荷兰、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大选结果中可见一斑。然而,德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又有其特殊性。德国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程度较之其他欧洲国家相对较低。尽管如此,德国也未能摆脱民粹主义对其“政治环境”的影响。经济疲弱是滋生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土壤,但德国作为全球工业创新与出口大国,近十年来的经济与就业形势都呈上升态势,民调机构迪麦颇公司(Infratest Dimap)的数据显示,在默克尔总理第二和第三任期之内,

<sup>①</sup> „Bundestagswahlergebnisse seit 1949– Zweitstimmen“, Deutscher Bundestag, [https://www.bundestag.de/parlament/wahlen/ergebnisse\\_seit1949/244692](https://www.bundestag.de/parlament/wahlen/ergebnisse_seit1949/244692), last accessed on 2 February 2018.

即 2009—2017 年,德国民众对国内经济形势满意度从 19% 上升至 84%。可见,德国民粹势力的兴起有其特殊的一面,不能单从经济维度理解。而透过“政治环境”的视角,可对其背后的社会机理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

在选择党的支持者中有很多是属于“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和“被轻视的业绩贡献者”“政治环境”类型的德国东部选民,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就是德国东西部居民的个人财富差异较为突出。两德统一之初,德国新联邦州居民收入只有老联邦州居民收入的 47%。1997 年,该比例增长至 75%,之后增长趋势陷入停滞状态。德国东西部收入平衡至今仍未实现。2013 年底,德国老联邦州的人均净存款额达到 48800 欧元,新联邦州的人均净存款只有 28600 欧元,德国东西部居民的个人经济状况差异日趋扩大。此外,即使全德失业率自 2010 年以来明显下降,但新、老联邦州之间的失业率差距仍然显著。在 2017 年 9 月这一选举月,东部联邦州的失业率为 7.1%,而老联邦州的失业率为 5.1%;2016 年,即使是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东部民众的失业率也是德国南部的两倍(见图 3)。

图 3 德国不同地区且具有不同职业资质的失业率统计(2016 年)



资料来源: Michael Hartmann, „Qualifikation und Arbeitslosigkeit in regionaler Betrachtung“,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Dezember 2017, S.28。

德国东部新联邦州较高的失业率以及较低的个人财富导致选民降低了对德国传统政党体制的积极评价。尤其是失业的东部居民对德国重新统一后的政治生态产生悲观态度,东部选民对德国民主制度以及全民政党政策的不信任度较西部选民更深,并由此产生对社会福利分配不均的不满。从民调中可知,88%的德国选民认为,德国政府并未做出足够努力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79%认为,德国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平。<sup>①</sup>而东部选民倾向将自身的财富窘境归咎于默克尔的移民与难民政策,抱怨难民占用德国社会福利支出,争夺就业岗位。德国东部联邦州,例如萨安州,即使其接收的难民人数比例少于5%,选民对难民的排斥情绪却较西部老联邦州更为强烈。该州在2016年联邦州选中,选择党在该州的支持率就已达到24%。<sup>②</sup>而在2018年6月至8月的民调机构“星期日问卷”中,德国东部五个联邦州(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图灵根州、萨安州和梅前州)民众在下届州选举中愿意支持选择党的比例均超过20%,选择党成为德国新联邦州的第二大党。<sup>③</sup>

2018年8月底,萨克森州开姆尼茨市发生的德国人与难民的斗殴事件触发左翼和右翼民粹团体乃至新纳粹的大规模冲突。虽然选择党和新纳粹群体关系模糊不清,但也引发了社会大讨论。萨克森州的极右、右翼民粹以及新纳粹势力不容忽视,支持选择党的选民在东部联邦州数量显著增长,其主张得到了保守主义者、阴谋论者、经济贫困者以及极端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德国全民政党在2015年难民危机中的错误预估,选择党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因抗议难民政策而迅速崛起,分走大量选票。85%的选择党支持者认为,该党是唯一可以代其表达不满与抗议的政党。<sup>④</sup>然而,在过半的德国人为过多难民而感到紧张的同时,也有过半的民众对右翼极端主义表示担忧。可以说,选择党的崛起、全民政党难民政策失误以及对原有选民阵营诉求的忽视加重了社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分歧与社会撕裂。

选择党在德国各个社会经济阶层中均有支持者。其中,在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被轻视的业绩贡献者”与“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中获得最多支持。这大多是由他们所处经济劣势以及对社会再分配失望而导致,在税后月收入低于1500欧元的选民

---

① „Umfragen Lage in Deutschland“, <http://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umfrage-gesellschaft.shtml>, last accessed on 3 February 2018.

② „Direkt zu den Wahlen am 13.03.2016“, <http://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6-03-13-LT-DE-RP/>, last accessed on 3 February 2018.

③ „Der unheimliche Aufstieg der AfD“, *Der Spiegel*, 37/2018, S.10-16.

④ „Umfragen Aussagen zu den Parteien“, <http://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umfrage-aussagen.shtml>, last accessed on 4 February 2018.

中,投票支持选择党的超过 50%;<sup>①</sup>虽然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上层的“批判型精英”和“参与型公民”对选择党较为抵制,然而经济上占优势的“传统的守财者”中也有较多成为选择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惧怕因外国移民涌入造成自身经济利益损失,担忧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

数据显示,在选择党的追随者中有 67%对个人未来感到担忧,有 62%担忧因难民涌入而导致德国社会犯罪率和暴力上升。<sup>②</sup>此外,选择党在德国社会经济地位中层的“政治环境”中斩获选票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失望的雇员中层”“不确定的个人业绩者”和“社会边缘的单独奋斗者”。曾经由“有危机感的雇员中层”衍变而生的“失望的雇员中层”抱怨社会并未兑现福利承诺,他们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利益回报与所创造的业绩不符,认为自己为社会所忽视,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利益受损者。而“不确定的业绩个人主义者”虽然仍支持市场导向型的自由经济,但他们也认为,全球化与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其应有的经济回报,且对数字经济等技术挑战无所适从。

## (二)德国全民政党式微的“政治环境”分析

全民政党长期联合执政,其政治共识带来政治稳定。为争取中间选民,全民政党的政治纲领高度重合。特别是在默克尔领导下,代表右翼以及中右翼选民利益的联盟党逐渐左转,吸收不少中左翼社民党有关社会公正的政策主张。然而,长期的中间道路也为全民政党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全民政党曾占据的政治光谱左右悬空,不仅大量的社会中上层选民分散至其他建制派政党,同时也为选择党吸引“抗议型”和“失望型”选民创造了空间。

全民政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类型中流失选票率不一,其中联盟党失去多达 22%的原有右翼保守主义选民,大多转投选择党或自民党;而社民党在各个“政治环境”类型中均流失选票。在 2018 年的民调中,社民党支持率频频跌破 20%,与选择党不分上下。其中处于社会上层的“参与型公民”中支持社民党的选民减少 14%,大量转投自民党。社民党在其传统的“雇员中层”以及“业绩贡献者”的选民阵营中更是大失人心,丢失选票多达 16%(见表 3)。全民政党的政策无法满足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选民在新社会环境下的意愿诉求。出于对全民政党的失望与抗议,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在短期内攀升,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加剧。

<sup>①</sup> Richard Hilmer,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Wer wählt Rechtspopulisten?“, Hans Böckler Stiftung, 08.2017, [https://www.boeckler.de/pdf/pm\\_fofoe\\_2017\\_08\\_09.pdf](https://www.boeckler.de/pdf/pm_fofoe_2017_08_09.pdf), last accessed on 4 February 2018.

<sup>②</sup> Richard Hilmer, Bettina Kohlrausch,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Eine Spurensuche nach Gründen für rechtspopulistische Orientierung, auch unter Gewerkschaftsmitgliedern“, Hans Böckler Stiftung, 08.2017, [https://www.boeckler.de/pdf/p\\_fofoe\\_WP\\_044\\_2017.pdf](https://www.boeckler.de/pdf/p_fofoe_WP_044_2017.pdf), S.32-33.

表3 2006年与2017年德国大选中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政党偏好比较

(单位:百分比)

	联盟党		社民党		选择党		自民党		左翼党		绿党	
	2017年	与2006年相比的变化	2017年	与2006年相比的变化	2017年	与2006年相比的变化	2017年	与2006年相比的变化	2017年	与2006年相比的变化	2017年	与2006年相比的变化
全部	33	-9	21	-11	13	-	11	+6	9	-1	9	+1
参与型公民	37	+3	24	-14	2	-	11	+9	8	0	15	-2
批判型精英	9	-5	25	-5	2	-	4	+1	31	+12	18	-16
对市场经济满意的新一代	41	-11	25	-7	9	-	10	+7	5	0	8	+3
保守的守财者	39	-22	14	-11	18	-	17	+9	1	-1	6	+3
不确定的业绩个人主义者	35	-9	16	-15	19	-	11	+1	8	+3	6	0
社会边缘的单独奋斗者	35	-	18	-	17	-	13	-	5	-	7	-
失望的中产雇员	31	-8	20	-16	12	-	13	+9	13	-2	4	0
被轻视的业绩贡献者	25	-14	20	-16	19	-	9	+5	13	-2	7	+3
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	22	+1	19	-5	39	-	3	-3	9	-22	3	-1

注:表由作者自制,相关内容参见 Rita Müller-Hilmer, „Gesellschaft im Reformprozess“,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2006; Jérémie Gagné, „Was verbindet, was trennt die deutschen? Werte und Konfliktlinien in der deutschen Wählerschaft im Jahr 2017“, S.21。左侧数据基于希尔默和加涅2017年研究划分的“政治类型”选举行为得出,右侧的变化数据是基于2006年针对原有“政治类型”的选举行为调查,具体类型衍生见前文所述。

### (三) 社民党中左翼纲领忽视各“政治环境”类型价值观分歧

第一,全民政党长期推行的中间道路导致社民党渐失中左翼“政治环境”选民。2003年,社民党总理施罗德以“哈茨四”倡议开启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在促进德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有限期合同与临时合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条件更为严苛,“中产雇员”“业绩贡献者”“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以及长期失业者对社民党政策右转的失望情绪日渐增长,认为社民党已无力再为其争取社会保障,原有的社会福利也难以兑现。自2005年后,社民党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已联合执政三届,社民党愈发缺乏关于提高公民福祉与促进社会公平的创新型且较为明确的政治理念。民调显示,66%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执政纲领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区分模糊。社民党选民中也有32%持此观点;80%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在社会公正方面的主张语焉不详,社民党选民中认同此观点的比例也高达66%;74%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没有令人振奋且新颖的纲领议题;此外,58%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并未主张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仅有18%的人感觉在上届大联合政府中亲身获益于社民党的政治主张。<sup>①</sup>在数字化与全球化时代,社民党作为代表工人和雇员利益的政党更难以应对劳动与分配的新问题,提出促进社会公正且顺应时代变化的建设性主张。社民党纲领逐渐失去特色。

第二,面对难民危机冲击,社民党政治纲领及党内辩论忽视新时期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价值观分歧,其政策主张未能有效应对变化中的“政治环境”类型新诉求。社民党的党内辩论与选民实际诉求渐行渐远,并未对原有的“政治正确”进行充分讨论。主张文化宽容、开放型社会、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选民与质疑欧洲一体化、反对接收难民与移民、主张维护德国主流文化的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选民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愈发激烈,特别是针对外国移民是否对德国主流文化构成挑战以及德国是否应在境内救助难民的问题(见图4)。但社民党在上述争论中并未发挥有效的主导作用,寻求在社会文化领域使“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选民达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在全球化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社民党忽视了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不同程度的经济与文化层面上的担忧。最终,对难民恐惧更深的社民党选民转投右翼民粹主义选择党阵营,人数达47万之多。此外,社民党高层在国内安全方面的主张并不突出,缺少像前社民党内政部长席利那样敢于对国家安全加强监管以及像财政专家扎拉青那样敢于对穆斯林文化展开理性辩论的勇气的人选。虽然他们与主张“欢迎文化”的

<sup>①</sup> „Umfragen zur SPD“, <http://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umfragespd.shtml>, last accessed on 8 February 2018.

社民党左翼争执颇多,却也代表了众多选民的诉求与担忧。<sup>①</sup> 民调显示,仅有 20%的德国选民认为,社民党在难民政策领域管理有方。在难民危机中,社民党更多地遵从了默克尔起初较为开放的难民政策,而对默克尔难民政策表示不满的社民党选民竟多达 52%。<sup>②</sup>

图 4 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价值观分歧程度  
(1 代表程度最轻,5 表示最严重)

分歧程度	012 345
<b>严重分歧</b>	
移民与难民丰富社会文化,	3.7
移民与难民对德国主流文化构成挑战;	
德国应救助入境难民,	3.3
德国应对难民实施当地救助;	
支持或反对德国进行国际援助与救助	2.8
<b>中度分歧</b>	
同行伴侣是否应享有同等社会权利;	2.4
国家应对社会福利再分配,	
国家仅负责临时性救助;	2.2
工会是否重要	2
<b>轻度分歧</b>	
社会是否平等;	1.7
确保自由社会优先,	
确保国家安全优先	1.4

注:图由作者自制,相关内容参见 Rita Müller-Hilmer und Jérémie Gagné, „Was verbindet, was trennt die deutschen? Werte und Konfliktlinien in der deutschen Wählerschaft im Jahr 2017“, p.17。

第三,社民党领导层与基层的政治价值观错位,内部离心力加剧。一方面,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重返德国政坛所带来的加成效应昙花一现,未能拯救社民党的颓势。

<sup>①</sup> „Sarrazin rechnet mit der SPD ab – „Keine Antworten“,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74193116/Thilo-Sarrazin-rechnet-mit-der-SPD-ab-Keine-Antworten.html>, last accessed on 8 March 2018.

<sup>②</sup> „Umfragen zur Flüchtlingspolitik“, <http://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umfrage-fluechtlingspolitik.shtml>, last accessed on 5 March 2018.



59%的选民认为,舒尔茨并不具备总理候选人的资质。<sup>①</sup>其与默克尔的竞选辩论,缺乏选战气息。特别是牙买加联盟的组阁谈判破裂后,社民党高层转而同意开启大联合政府组阁谈判,社民党愈发陷入联盟的组阁困境。舒尔茨从大联合政府反对者变为组阁谈判斡旋人,扩大了党内分歧与不信任。另一方面,社民党基层与高层之间的政治价值观分歧愈益严重。社民党内左翼青年团体(Jusos)及其领导者库纳特是大联合政府坚定的反对者,发起“不要大联盟”(NO GroKo-Initiative)运动,呼吁社民党基层反对组阁协议,认为正是因为多年来的大联合政府导致社民党主张社会公正的价值体系瓦解,丧失“政治环境”中层与底层选民支持。社民党没有真正推进“雇员中层”“业绩贡献者”以及“工作不稳定的贫困者”所期待的经济左派政策,如征收富人税和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社民党青年团与社民党高层的政治价值观分裂严重,却因代表传统左翼思想而为社民党内各种背景和年龄的成员所偏爱。库纳特凭借新媒体力量获得支持,不仅争取大量新成员加入社民党,且最终导致44%的社民党党员投票反对大联合政府。<sup>②</sup>可以看到,社民党政党纲领的定位与其原有选民群体的新政治偏好并不一致。

#### (四)“政治环境”分歧激发联盟党内部争端,默克尔权威下降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具有中右翼传统的基民盟内的“政治左转”引起党内保守派颇多争议,特别是其2015年开放性的难民政策。联盟党流失至选择党的选民人数超过100万人,其中“保守的守财者”由于大联合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中间道路”转投至选择党的比例多达18%,这也导致巴伐利亚的基社盟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难民问题上的争端愈发激烈,执政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第一,联盟党无法应对“政治环境”的新变化。联盟党内部对于长期以来的“中间道路”与“政治左转”早有争论,特别是巴伐利亚姐妹党基社盟认为,基民盟的难民政策已导致主张维护德国主流文化并且质疑移民与难民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投奔至选择党阵营,例如属于“保守的守财者”与“不确定的业绩个人主义者”等政治环境类型的选民。

基社盟领导人泽霍费尔出任内政部长后不断在难民问题上向默克尔施压,坚持设立接收难民人数上限。作为难民第一“接待处”的巴伐利亚选民对难民融入、基督教与穆斯林文化冲突、难民住房以及安全问题抱怨甚多,对开放性难民政策也多有质疑。2018年6月,泽霍费尔与默克尔在“是否在德国边界拒绝此前在欧盟其他成员国登记

<sup>①</sup> „Umfragen zur SPD“, <http://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umfrage-spd.s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March 2018.

<sup>②</sup> Imre Balzer, Matthias Bartsch, Selina Bettendorf, Annette Bruhns, Lukas Eberle, Annette Großbongardt, Hubert Gude, Hannah Knuth und Steffen Winter, „Regieren oder Reha“, *Der Spiegel*, 08/2018, S.28-30.

的难民入境”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泽霍费尔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基社盟在难民问题上大做文章也是为了在2018年10月的州选中维持优势,夺回因难民问题而流失至选择党的保守派选民,即争夺“政治环境”类型中的保守派选民。在2018年7月欧盟峰会上,默克尔积极寻求难民问题的欧洲解决方案,但谈判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难民问题”多边解决方案因欧盟各国相互推诿而障碍重重。

基民盟与基社盟的政治闹剧无疾而终,但泽霍费尔政治声望大幅下降,民众支持率降至27%,环比下降16%。此后,有超过78%的德国民众表示对联邦政府的工作不满;73%的民众认为,泽霍费尔以辞职相要挟削弱了联盟党与大联合政府的稳定性,<sup>①</sup>也加剧了德国民众对德国政治体系、民主制度和全民政党的不信任;60%的民众认为,没有值得信赖的政党。作为巴伐利亚的传统大党,基社盟在该州的支持率下降至33%(2018年10月),而选择党凭借14%的支持率有望成为巴伐利亚第二或第三大党。<sup>②</sup>联盟党已收紧难民政策,希望争取“政治环境”中社会文化领域内保守主义阵营的选民,特别是基社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政策主张与选择党更为重合,但其经济领域的惠民主张仍乏善可陈,借助限制难民入境的“声势”并未助其顺利赢回“政治环境”类型中“不确定者”与“失望者”对全民政党、德国民主制度以及政治精英的信任。

第二,基民盟内部保守派对默克尔权力形成抗衡。回归保守还是顺时革新?面对不同“政治环境”类型选民诉求,基民盟的政策调整陷入两难之境。基民盟内部争论的焦点在于回归中右翼保守阵营还是不断革新重振全民政党纲领。在应对难民危机与选择党崛起方面,以默克尔为首的革新派认为,基民盟若要留住多数选民就应革新纲领,拒绝回归右翼保守一极;而党内青年派代表施帕恩是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批评者,认为由于基民盟政策左转才导致近百万右翼保守选民流失至选择党,基民盟需要回归保守。目前,基民盟内部派别之争已公开化,施帕恩与自民党党首林德纳、联邦议院基社盟州党团负责人多布林特结成重振右翼的保守阵营,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造成严重政治混乱,导致选择党借机崛起。这也是默克尔被迫卸任党主席、不再连任的重要原因。

第三,全民政党在社会政策上继续趋同——“自由市场”与“社会公正”的妥协。默克尔宣称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为民众的实际诉求寻求解决方案,联合执政协议也

<sup>①</sup> „ARD-Deutschland Trend – 78 Prozent unzufrieden mit Regierung“,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deutschlandtrend/index.html>, last accessed on 10 July 2018.

<sup>②</sup> „CSU laut Umfrage nur noch bei 33 Prozent“, Zeit Online,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8-10/landtagswahl-bayern-csu-umfrage>, last accessed on 5 October 2018.

以此为已任。<sup>①</sup> 为促成大联合政府组阁,联盟党对社民党有关社会公正的主张做出较多让步。例如,提高就业市场的全职比例;反对儿童贫困,每月增加 25 欧元的儿童抚育金;大规模提高对学校基础设施的投资,五年内划拨 50 亿欧元用于改善学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反对老年贫困,提高老年人护理水平;至 2025 年退休金水平固定在原薪水的 48%;增加 8000 个护理岗位,并提高护理人员工资待遇等。联盟党虽然在组阁谈判中也为主张经济“自由市场”导向型的“政治环境”类型代言,比如保留两级医疗体系,反对增加富人税等。<sup>②</sup>但总体而言,在社会与家庭政策方面,联盟党继续吸收了有关“社会公正”的纲领主张,虽然“社会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平等”在各“政治环境”类型中仍处于中度或轻度分歧范畴,但全民政党政策在联合执政过程中进一步实现了经济领域的政策趋同。因此,丢失特色纲领、流失原有群众基础的风险犹存。

#### 四 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德国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受其经济与就业等社会状况的影响,各选民群体价值观分歧加重,特别是在涉及“开放型社会和自由主义”或“封闭型社会和权威主义”的社会文化领域。总体而言,德国“政治环境”趋向保守,部分选民的权威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如国家自豪感、维护德国主流文化、质疑难民与移民以及社会秩序的认同感显著上升。虽然近十年来德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中下层“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不安全感与不满意度也逐步升级,特别是在德国新、老联邦州选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仍存不小差距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全民政党长期联合执政导致政治纲领趋同,联盟党“不右”,社民党“不左”,在拉拢中间选民的同时,忽视了新时期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价值观分歧,尤其在社会文化领域。多年来,全民党仍未有效缓解选民主观上的“不确定性”,针对愈发多元化与个体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也没有做出及时的政策反应,在应对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社会辩论、政策沟通以及重塑社会共识上缺乏引导作用。在德国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失望型”或者“抗议型”选民开始寻求不同的代表,形成新的政党偏好,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坐大。全

<sup>①</sup> „CSU laut Umfrage nur noch bei 33 Prozent“.

<sup>②</sup> 社民党原本希望引入“全民医疗保险”,确保全民医疗福利平等,该提议为联盟党所否决。“两极医疗”体系中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者享受的待遇高于公保,特别是国家已为公务员支付 50% 医疗费用,为此公务员大多加入私保,享受更多福利。此外,社民党在试探性谈判中最初的要求是将最高税率从 42% 提升至 45%。此番“劫富济贫”的畅想并未如意,代表企业家利益的联盟党反对提高富人税。

民党的政策未能有效应对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的价值分歧以及未能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类型,不仅加剧了党内矛盾,而且导致选票大量流失。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政党越来越赢得选民的青睐。

在数字化时代,选民更易通过新媒体表达对政治精英的抗议与不满,支持“直接民主”制的意愿上升,这正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选择党所利用。<sup>①</sup>面对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全民政党缺乏创新性纲领应对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不同诉求。由纳税人承担的超负荷难民物质与融入课程开支以及欧盟支出导致部分选民心理失衡,加之有关难民犯罪的报道层出不穷,就内政部长泽霍费尔有关“伊斯兰不属于德国”的言论来说,同意者竟多达76%。德国社会曾引以为傲的“欢迎文化”不再盛行。德国重返大联合政府后,全民政党内部有关“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回归传统”或“中间道路革新立异”之争日趋激烈。联盟党内保守派持续施压,巴伐利亚姐妹党基社盟与联盟党在难民以及欧洲问题上龃龉不断,联邦总理默克尔在其第四任期内的权威不及从前;而社民党内矛盾未平,领导层与基层之间缺乏信任,党内人事斗争升级,这是其重整旗鼓的较大羁绊。未来在内部政治对抗风险加剧与政党格局碎片化的挑战下,德国能否在民粹主义肆虐的欧洲发挥稳定的领导作用值得关注。

(作者简介:黄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宋晓敏)

---

<sup>①</sup> Mathieu Von Rohr, „Der Hochseilakt—Die Arä der großen Parteien geht zu Ende. Auf das Land kommen unruhige Zeiten zu“, *Der Spiegel*, 08/2018, S.6.